

钱超英
著

“诗人”之“死”

一个时代的
隐喻

万叶文丛



学术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71

2611.065-
042

卅
万叶文丛
学术书系

钱超英 著

“诗人”之“死”

一个时代的隐喻

—1988 至 1998 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



文苑钱超英



A082965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 / 钱超英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万叶文丛)

ISBN 7-5004-2689-5

I. 诗… II. 钱… III. 文学，华人- 文学研究- 澳大利亚 IV. I 61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00470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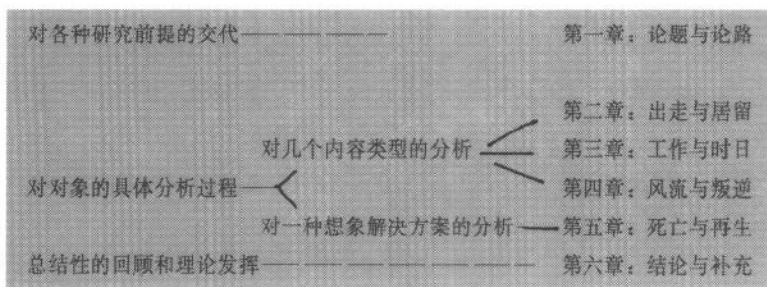
字数：197千字 印数：1—3,000册

定价：20.00元

前言

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对研究的目的、主题、对象、方法和历史背景等的交代；第二、三、四、五章是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实施具体介绍、评述和分析的过程；第六章则是总结性的回顾和必要的理论发挥。

基本的结构如下表所列：



从这个结构出发，第一章虽然有很多引导性信息的交代，但为了快速地了解本研究的结果，也许可以从第六章开始阅读。

至于具体的分析过程，特别是第二、三、四、五章这五章，虽然我已经尽量把具体材料通过条贯的论述加以系统化的整理，但由于本研究的对象在我国文学研究中还缺少集中的参证资料，因

此可能会使不熟悉这一论题范围的读者感觉到陌生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快速了解这几章对新华人文学实施具体分析的构思框架，先行浏览第五章也许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因为它是在汇集了具体分析过程内部反复出现的现象的基础上，对有关“死亡”命题的正面呼应。它包含了关于本研究内容构思的核心信息。

此外，考虑到本研究在资料和涉及到的问题的广泛，我并且在每一章结束的地方都安排了一段“本章小结”（第六章为“总结”），以方便对任何一章内容的快速了解。

“后记”简单介绍了我个人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和本研究从之获得帮助和支持的情况，它也多少包含了本研究准备和进行过程的信息。希望它们有助于对本研究的全面评阅。

第一章

论题与论路

——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研究策略

边界……是为了有人跨越而存在的，它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方便人们跨越，而不是为了妨碍他们。……我们必须找到我们的位置，不在已经为我们精确界定好的地方，而在界限尚不明确、有待界定的地方。

——艾力克斯·米勒《祖先游戏》第11章

一 本研究的目的和主题

本研究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目的：

1. 考察近十年来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相关表达活动的历史面貌、内容特色和精神机理，以达成对于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大陆知识分子移居西方各国的浪潮所导致的海外华人社会文化和文学变化态势的具体认知。

2. 分析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想象中包含的文化身份上的矛盾，以揭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中那些对理解当代人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和文化问题，以助益于更广泛层面的文化研究。

3. 利用这种考察和分析，调整或完善对海外华人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具有较高复杂度的现象的认识工具，并探索发展海外华人

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原则的可能性。

围绕着这样三个方面的目的，本研究形成了这样的基本主题：

在 1988 至 1998 大约十年时间内，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相关的表达活动已经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它包含一种持续性的紧张，这种紧张来源于多种因素交织的时空环境下的身份焦虑。这种身份焦虑，作为中国的、澳大利亚的和世界的历史文化之间互动变化关系的缩影及其结果，投放在新华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国际移民群体的经验基础之上，使这种文学必须以新的主题思想、结构方式和语言策略来呈现混杂的欲望、冲突的压力、变化的情感观念以及用以重构其社会文化角色认知的种种想象。从中，透露出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历程中面对自身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种种疑难。因而，它构成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人文化处境的一种含义广泛的隐喻，也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关于自身历史命运的文学叙述链条中值得重视的一环。

上述的基本目的和基本主题在本研究中，将具体展开为对下面一些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是包含着何种性质和意义的文学？它是在怎样的具体社会过程中出现和发育的？而它的性质和意义可以追溯到怎样的世界历史的语境？

——在这种文学中，为什么“身份焦虑”具有重大的主导性？这种文学对人的“身份”的处理有着怎样的和传统华人文学不同的方式，其中包含了哪些复杂的精神冲突？这些冲突如何影响了它的艺术想象及其表达策略的选择，从而使某些内容——例如某种关于“死亡”的描写——，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解决方案？

——通过对这种身份焦虑及其解决方案的具体分析，可以见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与中国大陆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历史及文化思潮具有怎样的联系、转换、投射、对应的关系，以致于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文学所探索的人生及人心的经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介入了当代文化对民族生活的历史处境和人类生活的普遍处境的探索，并成为了这种处境的一种隐喻？

——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上述处理，包含着那些可能比较有效地拓展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并把这种研究和其他更广阔层面的文学、人文研究联结起来的理解？

为了便于本研究对上述问题的具体解答，还需要对一系列有关的前提做出交代。

二 本研究对象限定：新华人文学

近年来，在澳大利亚主流传播界和研究界中，对过去约十年时间（部分在这十年前不久，大部分在这十年内的最初几年）从中国大陆前往澳大利亚所形成的华人群体的称谓，在原来通用的“中国留学生”的基础上，出现了转用“新华人”（New Chinese）这一概念的动向^①。本研究所谓“新华人文学”，就是指这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群体中产生的、基于他们特定的国际移民经历而创造的文学。这些文学大部分以汉语出现，但也包括由其中的双语作家以英语写成的作品。

“新华人”这样一个移民群体的“新”，不仅是由于在他们抵达之后，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背景居民的数量和文化影响与台湾、香港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华人移民相比一度微不足道的情况已彻底改变，从而大大更新了个国家华人移民的背景地图——他们带来了华人世界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分化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

文化背景；而且，也是由于他们从“留学生”演变成为国际移民的曲折经历，在他们中间留下了区别于其他移民——至少是其他来源地的华人移民——的独特记忆。这种记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中间的文学代表的想象活动，也影响了他们其他相关的文化表达的面貌，使海外华人文化的构成和特征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并对有关的描述、概括和学理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显而易见，本研究就其基础性的经验材料而言，可以归入广义的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域，但是，它对这种文学现象的处理不属于文学史方式，即它无意为这个领域的文学发展历程开列完备的档案，虽然它提供了一批我国海外华人华文的研究著作迄今为止尚未涉及的新资料；同时，虽然作者认为这种文学的确达到了某种国内研究界至今没有认识到的繁荣程度和有吸引力的人文素质，但本研究却不属于为推动这种文学的传播活动、即作为与创作界（翻译界）互动反应的艺术批评。就本研究由以组织材料的思路和涉及的问题而言，它以这种文学现象为纽带，延伸到了系列不同领域会合的边缘。例如，由于涉及到移民史，它介入了历史学；由于它的移民分析集中于某一区域的社会内部，它又可以归入文化研究中的“区域文化”研究的范围，虽然事实上它希望能把这个“地区性的”题材和一个“全球性的”背景联系起来；由于涉及人在传统意义上的“祖国”和后来移居的“外国”这样不同社会结构中社会角色的变化和精神心理的冲突，它又具有社会学、心理学和思想史研究的指向；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于一个旨在综合性地把握特定文学现象的理解过程，并服从于文学创造和人类生活系统诸因素之间的互动解说这一根本目的。

三 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现状概览

但是,本研究的发生和进行,仍然有赖于对这一事实的初步确认,即在过去十年间从澳大利亚“新华人”中产生的文学作品及其相关表达活动,在一定社会范围的传播数量上,在作为一个可供辨别的族群特征的标志意义上,以及在相关事件或文献的见证上,都已经成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1988年初,李玮的《留学生日记》在悉尼连载,成为新华人文化表达活动开端的一个显著标志。它以散文化的写实笔法,记载了他们作为“留学生”在澳国早期生活、工作的观感,曾激起了华人读者延续数月的强烈反响,可被视为“新华人”与传统移民和其他非大陆当代华人移民历史经历迥异,文化身份有别和观感方式不同的早期例证;

1991年,从澳大利亚返回中国的作家刘观德创作的中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此前及此后,它被中外多家报刊转载,成为这一题材最早为中国文学界所广泛知悉的作品;

1992年6月前后,澳大利亚多民族传媒的原有格局因“新华人”创办的传媒崛起而改观。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华联时报》(周报)在悉尼面世,以反映新华人立场的报道、时评,辛辣的杂文和大篇幅的文学作品迅速引起广泛注意并造就了一批具有影响的作者,成为澳大利亚“新华人”拓展自己表达阵地的重要开端;^②

1993年3月28日,“新华人”在著名的悉尼歌剧院上演了一出把“政治波普”的插科打诨和文化边缘人的哀乐悲喜混合在一起的大型诗歌音舞晚会《中华魂》,其“混乱”的效果受到当地中

英文传媒的显著报道和尖锐争辩，这种情况，连同新华人在其他表达媒介（如美术）的崛起，交会成新华人文化表达活动的活跃图景；

1993年10月8日，著名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威赫克岛）以斧头击杀妻子并自缢身亡，消息传来，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全球华人文化界激发广泛关注。并作为一种“寓言”，在澳大利亚新华人的文学想象和文化表达中唤起广泛的感应；

1994年初，赴澳前曾任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编辑的女作家施国英一篇关于性和婚姻问题的随笔，在澳大利亚内外的华洋舆论界激起轩然大波，从她一段关于中国人和西方人性爱比较的议论，引发了持续数年的舌战和笔战，并吸引过包括法新社、澳联社、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传媒的报道，也在美国华人中引起关注，并对有关性爱的文学写作构成了影响；

1995年12月，在“新华人”读者中具有影响的八位男性杂文作者联合出版了题为《悉尼八怪》的杂文集，曾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澳大利亚作家和汉学家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为之热情作序，称这些杂文为“一系列跨越文化的实际活动的快照”，“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独特的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个中国人在困境中所能展示的微笑，它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情感：顺从、苦楚、怀旧、玩世不恭与愤世嫉俗”^③；

1996年1月28日，一项国际性的文学活动——“悉尼作家节”，为《纸上的脚印——澳大利亚中英文双语诗歌散文集》一书举行了首发式，这本书选编译介了30位华洋作者的作品，以中英文双语对照合印，其中约十名作者属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华人”；

1996年2月，居于墨尔本的欧阳昱博士等创办了专门的中文文学杂志《原乡》（Otherland），由于其跨语种（主要是中英文）的

和涉及到中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稿源范围，以及其“后现代”的风格取向，它对“新华人文学”和其他语种、其他地区文学的交流起了重要的枢纽作用；

同一年，桑晔的长篇纪实作品《龙来的这一年》(*The Year the Dragon Came*)由昆士兰大学出版社用英语出版，这位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张辛欣合作过纪实小说《北京人》的作家，引起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文学界的高度关注，该书因深入记述“新华人”涌入澳洲后呈现的严酷生态和复杂心态而享有声誉；

1998年，九位“新华人”女小说家的作品合集《她们没有爱情》在悉尼出版，悉尼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萧虹博士(Lily Xiao Hong Lee)在该书序文中认为，它显示了新华人的创作“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飞跃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后受西方思潮影响形成的多个阶段，反映了直接处身于西方社会下当代中国青年艰难的、冲突的文化选择^④；

几乎与此同时，欧阳昱博士一部约三千行的英文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The 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出版，它以尖锐的自嘲与嘲人相结合的手法探索了“新华人”在西方社会中文化身份高度混乱的问题，揭示了国际移民运动在其文化心理上造成的重大代价，其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激烈的文化批判使之被视为澳大利亚文学中“《荒原》”式的作品^⑤……这些还仅仅是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艺术表达活动的若干事件。他们的作品除流行于澳洲外，也有的流传于我国大陆、港台地区，并传及北美，在我国大陆出版的单行本除了《我的财富在澳洲》外，尚包括了刘奥《云断澳洲路》(长篇小说，群众出版社1995年)、毕熙燕《绿卡梦》(中篇小说，华夏出版社1996年)、李昕《悉尼梦》(长篇小说，成都出版社1994年)、李玮《遗失的人性》(中篇小说，北京出版社1994年)、武力《娶个外国女人做老婆》(报告文

学，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王晋军《澳洲见闻录》（散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张奥列《悉尼写真》（散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5 年）、海伦《留澳日记》、千波《旅澳随笔》（散文集，成都出版社 1995 年）；诗集则包括欧阳昱《墨尔本之夏》（重庆出版社 1998 年）、林木《悉尼的情思》（译林出版社 1995 年）和庄伟杰《神圣的悲歌》（1998 年）等等。而在香港出版的单行本包括了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短篇小说集，1995 年）和张奥列的《澳洲风流》（小说散文评论集，1996 年）。其他在澳大利亚当地出现的单行本则还有陶洛诵《留在世界的尽头》（中篇小说，1992 年）、方浪舟《鹰的诞生》（诗集，1993 年）等等。^⑥

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涌现引起了澳国教育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 年 8 月，悉尼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梅布尔·李（Mabel Lee）向在比利时雷登大学召开的第 15 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崛起的声音——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论文，她在这篇文章里着重介绍了部分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澳大利亚作家。在澳大利亚国内，新华人作家的不少作品已被翻译编选进各种供学生阅读的文化教材，和供一般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参考的多民族作家作品集。1995 年，一个英文出版社把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和在相近时期出现过的另一部由皇甫君写下的类似题材作品《澳洲，美丽的谎言》合编在一起，以《苦桃李》（*Bitter Peaches and Plums*）为书名翻译出版。这些译介活动，使新华人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开始获得更多的评论和研究。数以十计的英语文学、文化和新闻出版物发表过欧阳昱的评论和专访。英语世界中并出现了专注于新华人文学研究的学者，除前面提到的尼古拉斯·周思、梅布尔·李和萧虹等人的持续关注之外，文化研究者温卡·奥门森（Wenche Ommundsen）女士正在汇编有关的论文集，将由狄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现在澳大利亚高校从事研究工作的新华人背景学者钟勇 (Yong Zhong)、蒲潇等人则经常以中英双语发表有关新华人文化的学术成果。文学评论家张奥列等也经常在华文媒介上发表推介新华人作家作品的文字。

包括上述文本和案例在内的所有属于和涉及到新华人问题的表达现象,不管是那些明显想象性的、具有成熟风格的文学标本,还是作为多少变形了的写实经验的朴素记载,不论是出自赴澳前在中国大陆文学界已经知名的或是尚不知名的作者之手,也不论是纯粹的印刷文字,还是其他形式的表达,我都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取证和研究。它们为本研究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验基础。

四 本研究课题的对象在我国的研究进展

由于一个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可能提供的贡献的估计,对其课题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因此,除了提示上述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相关表达活动的认知范围以外,还应提示一下我国国内学术界在同一领域的工作进展。

在我国,对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的无论是主流的英语文化还是华人华文文化的研究,在我国都是一个新近开辟、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领域。本研究的作者所已经做过努力的资料搜索范围,主要涉及两个研究“阵营”的情况,第一个是那些主要以外语教学和研究为主的学者阵营,其中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近年相当活跃,这个阵营主要以几名在八十年代中期受澳国政府资助留学,学成返国的学者为骨干和主力,他们的译编、论著已经使相当数量的澳大利亚“主流作家”(白人英语作家)的作品和有关研究成果在我

国大陆得以问世，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地改变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只知道一个珀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 1912—1990年，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狭窄局面。他们的成果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和文化界各种形式的鼓励。然而，包括在这批成果中的几本最有分量的著作都基本没有涉及该国的华人华文文学。^⑦

第二个“阵营”则是由那些主要从事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且工作语言为汉语的学者组成的。和第一个阵营比较，他们在对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的研讨建立了广泛成果的同时，对澳大利亚、大洋洲地区的华人华文文化和文学，对它在澳大利亚这个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的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意义，研究却相当不足。通常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领域，长期以来主要是以三大部分（依地缘划分是近距离的香港、澳门、台湾，中等距离的东南亚、和远距离的欧洲北美——其实主要是美国）的华文文学为注意的对象。这种结构的板块格局尽管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的认识，但在今日迅速涌现的全球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显然并不完备。以澳大利亚为例，它连同新西兰已是当今西方世界在西半球和南半球最大的华人移民接收地，而其华人文化问题却基本上没有成为我国学界注意的重要对象，对该区域华人华文文学八十年代末至近期的发展（主要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急剧改观），则只在很少的几篇评价资料中得到一些反映。^⑧除此以外，作为本研究的作者，我没有在我国大陆地区发现任何针对这一课题的专门及系统的研究成果。至于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虽然来自这一地区的与华人文化有关的“消息”并不缺少——例如，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长篇小说之一《我的财富在澳洲》在多份报刊的连载和其单行本的畅销，九十年代中期震动国外内文化界的新西兰“顾城事件”……等等。但国内研究界如何越过“消息”、“事件”

和“动态”的界面，对该区域更多的华人文化及其组成部分的文学状况做出详切的学术探讨，仍是有关的学术研究中面临的问题。

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这里暂时可予以简要提示的至少有这么四个：第一是该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的相对疏远，和它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关系中曾经无足轻重的性质；第二是由这种疏远和不重要而导致的对其文化面貌的资料收集不足，连带对其华人文化和文学过往和新近的发展也未予注意；第三是作为该地区主要部分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华人华文的文化表达直到九十年代以前都没有形成值得注意的规模；最后，第四，海外华人和华文文学研究的有效拓展，需要一种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清晰认知和总体把握，作为自己的解释基础，而这样的解释基础在很多这类研究中体现得并不明晰——应该承认，相对于只着重研究中国本土生发的那一部分文学问题的研究工作而言，我国的海外华人和华文文学研究在构筑这样的解释基础时，面对的是远为复杂和广阔得多的历史场景，因此更容易受限于文化视野的不足，也更容易因循对“主流”现象的执着和对“边缘”发展的忽略，从而也更容易受限于对新经验、新领域和新趋势的不敏感。

但是，我也同时认识到，以上的几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我将在具体展开本研究的同时致力于提示和分析这些转变。而其中最后一种，即第四种情况的转变，则是本研究所欲促进和参与的。对此，我应该对本研究从兹受益的有关理论进展作出必要的交代，这种交代同时也提示了本研究所由生发的方法论背景。

五 本研究对海外华人历史问题的 的总体理解框架

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这样一个信念：一旦加强了对全球历史趋势的把握，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必将能够增强其文化解释的能力，并大大拓展其研究空间。在这一点上，我深受饶芃子教授和费勇博士合作的一篇重要论文中的相关观点的启发。1996年，他们在题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一文中对“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自身意义基础上的种种问题作了严肃的反思，指出：考虑到海外华人身份的高度复杂性，从某种角度来看，有时“‘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不但不能揭示它们的意义，反而会遮蔽许多意义”。该文并且尖锐地提出了“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具备被解释的广阔空间，从而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⑨。对我来说，这种久已潜藏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深刻疑虑，与其说更着重于学科概念的严密化，不如说是更着重于拓展学科视野的呼吁。同样的开拓性信息，也可以在饶芃子教授关于“新华族文化观念”的提法^⑩中发见。更为重要的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这篇论文提出了这样的文学—历史观点：

……因而，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包含着四种历史的影像，一是海外华人史，二是海外华文文学史，三是居住国的历史，四是中国本土的历史；这四种历史以“海外华文文学”为纽带产生关系，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本身有着重大的制约作用，而海外华文文学又从文学的观点补充一般通史的见解。由这样的具体例证，我们又可引申出文学与历史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的提问，从而达臻某种文学理论的形成。^⑪